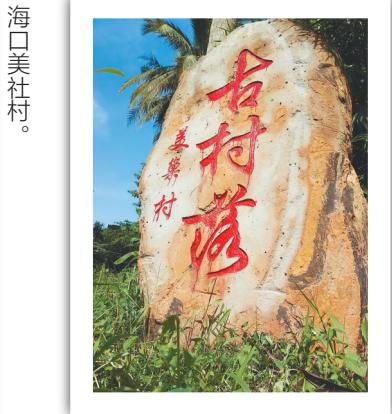


琼州自古有“美”名

■ 本报记者 陈耿

12月2日，海口美兰机场二期工程投入使用。鲜为人知的是，“美兰”这一地名，是海南建省后才出现的，迄今不过30余年，其所在的美兰区，则是在2002年海口市和琼山区划调整后设立。

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“美兰”的“美”字，本义与美丽、美好无关，却与“母亲”“伟大”相关。专家学者通过研究海南岛上大量含“美”字（或类似发音）的地名，发现它们承载着一个族群的居住和迁徙信息。



美巢村里胡铨的碑文。

A “美兰”原先叫“美男”

海口市东部演丰镇有个美兰村，村子附近有个墟市，建省前那一带统称为“美男”，无独有偶，海口南部有个地方叫“美仁坡”，以至于在互联网“古典时代”的BBS上，有人戏称这两个地方是否分别盛产美男子和美人，且遥相呼应。

然而，语言学家研究发现，在海南闽语（俗称海南话）的发音中，“美”作为美好、美丽的语义，念作 moi，但在绝大多数含有

“美”字的地名中，却读作 mai；而发音为 nam 的“男”字，也有写作“南”、“楠”或“滴”的，意为与“水”相关的江河溪流等，与男性无关，只是一个用于记音的用字。

事实上，“美男”在正式改为优美、文雅的“美兰”之前，还一度被写成“美蓝”，这其中似乎是民间记录和行文的随意性所致，也反映出这类地名书写源于发音而非基于字义的明显印记。

B “美”字原意为“母”“大”

那么，海南岛上含有“美”字的地名，是什么意思呢？

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剑三认为，地名中发音为 mai 的“美”字，汉义为母亲、雌性、姓氏或物体之中的最大者。如，临高县的“美仓”，意为大山林（临高语山林称 sang，仓字是其音译），还有“美南”，意为大溪。

除了“美”字，在临高语中与之发音更为接近的汉字“迈”，也较常见和多用。

比如，海口市母亲河美舍河畔、明代进士李珊的故里“迈瀛村”，以及桂林洋大学城附近、清代广东最后一位解元（乡试举人第一名）曾对颜的祖居地“迈德村”，还有明代临高举人、有“吟绝”之誉的王佐的家乡“买愁村”（今美巢村）。这两个都是颇有文化积淀的历史名村。

刘剑三在查阅方志时注意到，其实从宋代至明代，“买”字打头的临高语地名还非常多，这个字段读音也是最接近临高语发音的，清代以后，人们追求地名的雅化，才逐渐

改为“迈”和“美”。明代府城进士郑廷鹤就写过一首五绝《买盈村》：“洋洋一掬水，纤石自为堤。洞识盈虚理，高山是指迷。”“买盈村”就是迈瀛村。

从“美巢村”等地名之变，刘剑三教授指出，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译名中，只会发现后译者比前译者更有字面意义上的美感，而没有发现与之相反的，这种情况表明，人们的审美价值由单纯的求真尚实到求雅尚美。

语言语音总在发展变化当中，比如元音中的尾音脱落，临高语也不例外，原先的 mai 音，尾音 i 脱落后，变成了 ma，记作“麻”或“马”等，譬如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的“麻余村”和琼山区旧州镇的“麻钗村”。

最近两年，刘剑三在临高县调查发现，当地临高语中元音脱落现象也比较常见，人们称呼树名时，mai 音就变成了 ma 音，比如将大叶榕叫作 ma vang，把槟榔唤作 ma long（美榔）。

C 临高语族群先民原住地

有道是，地名是人类活动史的“活化石”。

“临高人”早在秦代以前便已迁入海南岛。据原广东省民族研究所梁敏、张均所著的《临高语研究》（1997年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）介绍，“临高人”主要分布在海南岛北部地区，“东起琼山县的南渡江，西迄临高县的新盈港，南以琼山县的遵潭、澄迈县的白莲和儋县的南丰为界，北濒琼州海峡，包括临高县全境和儋县、琼山县及海口市郊的各一部分。”

刘剑三教授在其《海南地名及其变迁研究》一书中推断，从现今的地方来考察，“临高人”历史上活动和生活的地区要大得多，仅以比较典型的“迈”（迈）为领头字的地名为例，此类地名分布在临高、琼山、澄迈、儋州、定安、文昌、屯昌、琼海等市县的300多个自然村，可以推断这些地方都是早年“临高人”活动和生活的地方，其中大本营在临高和琼山，但越往东部和南部“临高人”越少，目前定安、文昌、屯昌、琼海这四个市县已经没有“临高人”而全部是琼州人，可能是历史上迁琼州人大规模进入后，他们撤回“临高人”大本营，或者就地被归入同化了。

此外，由于万宁和原先的民族地区离大本营较远，“临高人”没有进入这些地区。

“总之，有‘美’（mai）的地方就有‘临高人’。”刘剑三说，“具体如澄迈县境内西汉时曾设置苟中县，治所在美亭乡（今属金江镇）美中墟。根据地名，西汉时该地区是‘临高人’的主要活动区域，不过现在那里已没有‘临高人’居住。”

魏晋时，有位著名“吃货”叫罗友。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记载：罗友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，经常吃了上顿愁下顿，吃饱吃好就成了他一辈子的孜孜追求。

那时，大户人家经常会在祠堂摆祭品祭祀祖先，祭祖仪式结束后，会把祭品分发给众人。罗友打听到哪家准备祭祖，就会赶过去打秋风。一次，因为去得太早，祠堂还没开门，他就守在祠堂门口等。主人家出来迎神时看到他，罗友大方地回道：“嘿，我听说你家祭祀，就想来讨点好吃的。”说完就往门后一站，耐心等到祭祀结束，上去就吃。碰上十里八乡有办红白喜事的，罗友更是从无遗漏地主动出席。当然，以他的家庭条件没有也不会随礼的。

桓温任荆州刺史时，罗友在他手下当从事。尽管生活水平有所提高，但罗友依然不改吃货本色，逮着谁就在谁家蹭饭。对于这点，桓温看不过眼，就邀罗友到他家，结果被罗友拒绝了。

一次，桓温摆宴为车骑将军王治送行。按照罗友的官职级别，本来没资格参加此类饭局，但罗友不请自来，说有要事要向桓温汇报。桓温就让人给他安排座位，边吃边聊。罗友坐下后，两耳不闻身边事，一心只满足味蕾，旁若无人地挥箸如飞，大享饕餮盛宴。酒足饭饱后，罗友正准备闪人。桓温一眼瞧见了，就招呼他。罗友停步，一脸迷惑。桓温郁闷地说：“你刚才不是火急火燎地跑来找我汇报事情吗，怎么还没说就要走了？”

当众被桓温拆穿谎言，按说也够尴尬的了，但看罗友脸不红心不跳，摩挲摩挲撑得滚圆的肚子，冲着桓温一拱手，很老实地说：“我听说白羊肉味美无比，但这辈子还从没吃过。听说您给王将军设宴饯行，席上有传说中的白羊肉，就特地过来尝尝。其实我没什么事，现在我吃饱了，就先告辞了。各位慢用。”说完就走了。桓温也拿他没办法，一笑了之。

后来，罗友被任命为广州刺史。临行前，桓温的弟弟桓豁请他吃饭。结果，罗友却推掉了：“抱歉，我已经跟朋友约好共进晚餐了，不如咱们改日再聚。”桓豁不信，派人偷偷跟着他，发现他居然去了桓豁下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吏家里，两人吃喝说笑，欢乐无限。对于罗友这种宁跟下属吃饭也不赴领导饭局的表现，桓豁表示很费解。其实，罗友的想法很单纯，对他来说，吃饭重在内容而非形式，重要的是吃得开心快乐，至于跟谁吃，并不是那么重要。

宋代是如何造神童的？

■ 刘永加

近日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“神童”魏永康不幸英年早逝，时年38岁。人们闻讯不禁为之痛心惋惜，也有不少人从他身上的传奇开始反思神童现象。

宋代造神童成热潮

回望历史，宋代是出现神童较多的时代，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教育方式有关。但据史料记载，宋代神童虽多，但最后能够成为大材的却很少，有的神童长大后就淹没在人海里，再也没有闪过光，当时堪称“网红”神童的“方仲永”就是典型代表。

所谓神童，就是指那些智力超常的儿童，往往天生的成分较大，是可遇不可求的人才。然而在宋代却涌现出了一大批神童，这种现象值得关注。当时比较出名的神童有：王禹偁6岁、孔文仲7岁、蒋堂6岁、黄庭坚7岁会作诗；王曾从小“善为文辞”，苏轼10岁“闻古今成败，辄能语其要”；叶梦得“嗜学早成”；张孝祥自幼“读书过目不忘，下笔顷刻数千言”；陈傅良几时为文章，自成一家，等等。特别是江西金溪农家子弟方仲永5岁“未尝识书具”，但能“指物作诗立就，其文理皆有可观者”。更有甚者，神童杨亿“数岁不能言”，却突然吟咏出《登楼》诗：“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”

为此，宋代在贡举中专门设立了神童举，又叫童子举，经考试得官或赐出身，称为神童。其中宋真宗时的宋紘、晏殊、姜夔、李淑、蔡伯希等，先后中童子科，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，而福建蔡伯希年龄最小，仅有3岁，宋真宗还为其赋诗一首：“七闽山水多才俊，三岁奇童出盛时”。

正是宋代这种童子举制度，催生了人们造神童的热潮。因为这一科制的设立，为宋代士子提供了一条入仕的捷径。所以办学之风在宋中期大兴，显然与童子举不无关系，在京城开封和州县小学以及私人书院纷纷建立。据《文献通考》记载，宋神宗元丰时，置在京小学有“就傅”“初盆”两斋。宋徽宗时办学之风尤甚，政和四年（1114年），小学生近千人，尚有继至者分十斋处之。收八岁至十二岁儿童，率以诵经书字多少，差次补内舍、上舍。州县小学参考在京小学規約办学，其学生皆备餐钱就食在校学习。

选拔神童重视诗赋作文能力

既然宋廷如此重视神童试，那当然想选到真正的神童。因为童子试比较热门，所以求试人数逐年增加。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九月，一次求试者竟达10人。对此，宋廷不以为荣，反而引以为患，他们发现神童的质量有问题，并不能尽如人意，所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控制。

宋廷要求地方州、县严格控制申报人数，在年龄上不得假冒，“念书童子十岁以下许试”。宋廷对神童试的人数屡加限制，其原因是求试者水平下降，引起大臣们的不满。官至南宋宰相的沈括曾就其原因分析：“（求试童子）但能读一诵，未能通义理作文”。再加上童子举，考试科目的单调、陈旧、人数太滥，造成神童质量严重下降。

对此，宋高宗很清醒，他曾说：“上有所好，下必有甚焉，盖由昨尝推恩一二童子，故求试者云集，此虽善事，然可以知人主好恶，不可不审也……朕即位以来，童子以诵书推恩多矣，未闻有登科显名者。”所以，对于这些神童，宋高宗一方面限制参加童子试的人数，另一方面对于推荐上来参加考试的神童，采取奖赏后均予以放归原籍。

对于童子试的改革，宋高宗从改革考试制度、考试内容着手。要求应试童子除记诵经文，须赋诗、会诵读、理解御制诗文，以考察考生的理解力和遣词造句的作文能力。

宋廷在完善童子举制度上做了不少尝试，但他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，那就是如何把选出的幼小神童，培养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。被宋廷赐予出身的神童，除少数出身于官宦之家子弟杨亿、晏殊、李淑等得官外，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培养他们，相反对绝大多数都予以遣返原籍。

久而久之，这些神童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慢慢地销声匿迹了。即使那些有幸被收入朝廷的少数神童，也有不少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培养，一样毫无建树。

王安石曾记述一个神童方仲永的遭遇。方仲永五岁时就会写诗作文，邻居乡亲看了他的诗文“甚为奇之”，并纷纷送钱资助，于是方仲永成了当时的“网红”神童。可是他的父亲不是好好培养孩子，而是拿儿子的天才来谋利，整天带着孩子访亲问友，以获取钱财，不再让他学习。于是渐渐“不称前时之闻”，而终成“泯然众人”，最终沦落乡野，无人问津。

对此，王安石感慨道：“仲永之通悟，受之天也，其受之天也，贤于材人远矣。卒为众人，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。”神童再聪明，如果得不到应有的继续培养和教育，也难成大材。



张元济先生

■ 史鉴典录

张元济 为育英才弃高薪

张元济1867年出生于浙江海盐，字菊生，号筱斋，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、教育家和爱国实业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年轻时，张元济为给祖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教育人才，曾主动放弃高薪工作，加入一家小作坊里，其过人的胆识在当时令许多人佩服不已。

1898年10月，张元济接受南洋公学（上海交通大学）创办人盛宣怀

的聘书，开始出任公学译书院主管。时间不长，因为能力出色，他又开始担任公学总理，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职位，待遇也非常优厚。然而，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，正当张元济事业做得一帆风顺之际，他却突然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，加盟到商务印书馆。

要知道，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，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，没有一点名气。如今，张元济放弃在南洋公学的显赫地位，跑去跟一个小业主进行合作，这样令人大跌眼镜的“华丽”转身，让许多人感到不解和困惑，同时也不禁为他的前途捏一把汗。然而，张元济却像没事人一样心态平和，他还反过来安慰那些为他担忧的人不必多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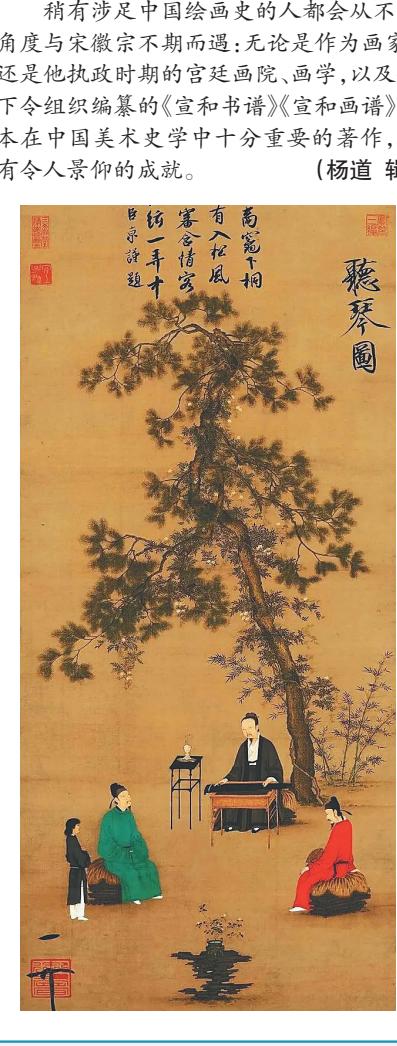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当时的张元济在心里早已树立了一个远大的理想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，为祖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教育英才。而如果想要实现这个理想，就必须出版更多优秀的书籍以开启民智，张元济觉得自己有必要肩负起这个重担。最终，在张元济的擘划下，商务印书馆逐渐声名鹊起，先后编写了小学、中学以及大学的全套教科书，同时组织翻译出版了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，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。除此之外，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《辞源》，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。

当时，为了让商务印书馆发展壮大，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、兼容并包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。在1920年到1922年期间，他先后招来了陈布雷、谢六逸、郑振铎、竺可桢、顾颉刚等青年才俊，这些人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。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“五四”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，成为“各方知识分子汇集”的中心。

最终，张元济靠着自己的胆量和魄力，将一个小作坊式的印书馆，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出版商。虽然历经时代剧变，但他点燃的簇簇文化灯火，却至今仍未暗淡，并一直照耀出夺目的光芒。

张元济1867年出生于浙江海盐，字菊生，号筱斋，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、教育家和爱国实业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年轻时，张元济为给祖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教育人才，曾主动放弃高薪工作，加入一家小作坊里，其过人的胆识在当时令许多人佩服不已。

1898年10月，张元济接受南洋公学（上海交通大学）创办人盛宣怀



■ 姚秦川

张元济 为育英才弃高薪

张元济1867年出生于浙江海盐，字菊生，号筱斋，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、教育家和爱国实业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年轻时，张元济为给祖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教育人才，曾主动放弃高薪工作，加入一家小作坊里，其过人的胆识在当时令许多人佩服不已。

1898年10月，张元济接受南洋公学（上海交通大学）创办人盛宣怀



投稿邮箱 hnrbyfb@sina.com